

国学典籍阅读要义



吴孟复 著

国学典籍阅读要义



《古书读校法》

《训诂通论》

《古籍研究整理通论》

中国书店

Z126/33

2008

吴孟复 著

国学典籍 阅读要义

古书读校法

训诂通论

古籍研究整理通论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典籍阅读要义/吴孟复著.-北京:中国书店,2008.4

ISBN 978-7-80663-540-7

I. 国… II. 吴… III. 国学-古籍-研究方法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1968 号

国学典籍阅读要义

吴孟复 著

责任编辑:钱律进 宋莹 汤慧芸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泰山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88 千字

印张:15.5

书号:ISBN 978-7-80663-540-7/K.209

定价:38.00 元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有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

目 录

《古书读校法》

第一章 治学与读书	(3)
第一节 治学的途径与方法	(3)
第二节 治学与积累资料	(6)
第三节 怎样才能读懂资料	(9)
第四节 读哪些书	(16)
第五节 怎样读书	(21)
第六节 怎样查找资料	(27)
第二章 古书的目录与版本	(31)
第一节 书目的历史、作用与分类	(31)
第二节 善本书及其鉴别方法	(38)
第三章 丛书、类书及经史要籍	(49)
第一节 丛书的种类与功用	(49)
第二节 类书的体制与作用	(54)
第三节 “十三经”及其注本	(58)
第四节 古代史籍与“二十五史”	(69)
第五节 “十通”与“会要”	(76)
第四章 辨伪、辑佚与校雠、训诂	(82)
第一节 辨伪与校雠	(82)

第二节	辑佚与辑佚书	(89)
第三节	训诂方法的要点	(94)
第四节	故训与新解	(114)
第五章	诗词的阅读与研究	(130)
第一节	诗词的阅读与欣赏	(130)
第二节	怎样研究诗词	(145)

《训诂通论》

绪论	(155)
第一节 为什么要学训诂学	(155)
第二节 为什么既要尊重故训, 又不能墨守故训	(157)
第三节 用训诂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160)
第一章 训诂及其历史	(168)
第一节 训诂释名	(168)
第二节 训诂与传注	(170)
第三节 实用与理论	(172)
第四节 训诂的历史与经验	(174)
第二章 训诂与文字、音韵	(187)
第一节 训诂与文字形体	(187)
第二节 训诂与古音声韵	(197)
第三章 训诂与词气、文法	(220)
第一节 必须分清字、词及合成词的构词方式	(221)
第二节 必须分清词之虚实及词义通别	(225)
第三节 必须体会文理、语气, 注意修辞特点	(231)
第四章 训诂的方式、方法	(241)
第一节 代言与义界	(241)
第二节 形训、声训与义训	(253)
第三节 训诂用语示例	(263)

第四节 古书校注述例	(268)
------------------	-------

《古籍研究整理通论》

第一章 语言与文学	(275)
第一节 言能尽意	(276)
第二节 语有达诂	(282)
第二章 辑录与考辨	(287)
第一节 辑录	(288)
第二节 考辨	(293)
第三章 版本与校勘	(307)
第一节 校勘之益	(308)
第二节 校勘之难	(311)
第三节 校勘之要	(317)
第四章 章句与标点	(323)
第一节 句读与意义	(324)
第二节 讹误之缘由	(326)
第三节 句读之妙	(333)
第四节 句读之要	(337)
第五章 语义与注释	(341)
第一节 注释之难	(343)
第二节 误释之由	(347)
第三节 释词之要	(360)
第六章 篇章与教学	(376)
第一节 篇章语言之妙	(377)
第二节 词语使用之妙	(385)
第三节 层次衔接之妙	(388)
第四节 转折分合变化之妙	(392)
第五节 奇偶之妙	(394)



第六节	声调之妙	(396)
第七节	因时立言之妙	(398)
第七章	分析与欣赏	(400)
第一节	诗词语言艺术	(400)
第二节	散文的语言艺术	(415)
第三节	诗词鉴赏	(426)
第四节	散文赏析	(437)

附 录

附录一	略谈文史工具书的使用	(447)
附录二	古代辞书简说	(468)
附录三	丛书校点注释通则	(480)

4	后记	(1)
---	----------	-----



古书读校法

GU SHU DU XIAO FA

第一章

治学与读书

第一节 治学的途径与方法

做学问要读书，读书要识途。所谓识途，就是掌握途径与方法。近年来，有些青年同志垂询及此。我想起：早年也曾向柳翼谋（诒徵）先生问过；柳先生说他也问过缪筱珊（荃孙），筱珊教他读《说文》与《汉书》，依而行之，颇有效益。经过几十年，我体会到：讲《说文》，意指文字训诂；讲《汉书》，意指目录、校讎与典章制度（大都包括在“十志”中）。这涉及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个方面。

但是，使我耳目一新的，还是读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之时。本来，我早已从戴东原（震）、姚姬传（鼐）的文章中，知道“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之说，只是领会并不深，甚至是错误的。读了郭书，我才知道：讲义理，就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郭沫若的成就就是由于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因而度越前人。至于考



据，则指资料的搜集与鉴别；而词章，则指文理、文法，包括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中所说的各点，这是读懂资料的前提。古人把义理、考据、词章理解为汉学、宋学、古文，显然不当。

几十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在实际工作中，体会日渐深入，益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与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正是一致的。

基本理论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各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如治史学要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治元明戏曲的要懂得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学术的分类很多，各科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是科学的分工，分工愈精，研究愈细。

但就文史研究工作来说，有些知识与技能却又是基本相同，各科皆需的。因为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某一门类或某一专题，而问题所涉及的以及所要用到的资料，却往往不是门类所能限的，至于方法则更多相同。以治《说文》言，学者有搞目录的，有讲版本的，有考逸字的，有写“校议”的，还有作“引经考”的。这就是说：目录、版本、校讎、辑佚等方法在这里都用上了。研究红学，也要先查书录与资料索引，才能知道有哪些版本与哪些研究论文；还要做些校讎工作（如“新校本”）与辑佚工作（辑曹雪芹的佚诗佚文），对于佚诗、佚文的真伪问题还要进行考辨。由此可见，说目录、版本、校讎、辑佚、辨伪等为文史学科的基本技能，大概是可以这样说的。其中，尤其是目录，它不止分门别类，部录群书，而且还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汉书·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来看，实无异于学术史。因此，前人把它看作“学中第一紧要事”，即因通过它能使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当然，目录、版本、校讎等等皆为专门之学，但就其作为基本技能来说，又是文史研究工作者所必须而且可能掌握的。

再就基本知识说：文字训诂，应该是读书者首先必备的知识。搞文史，必须读古书，也就必须了解古字、古义与古人用词、行文之习惯。前人指出“合字形、字音、字义为一，方是小学；结合历史，而后可言训诂”，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否则，就会望文生训，或者以讹传讹。

除此以外，还有历史知识，特别是食货（经济制度）、兵制（军事制度）、职官、选举（人事制度）与地理沿革等等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识。试以杜甫的诗为例来说，不了解唐代的食货、兵制，是读不懂杜诗的，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再以李白出生地点为例来说，如不知有两个碎叶，那就无从得出结论。关于典章制度的书（即“政书”）很多，但常用的是“十通”与“会要”以及“史志”。地理则除诸史“地理志”外，还有《水经注》（杨守敬有《水经注疏》）及《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与明清《一统志》、《历代沿革表》、《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各地方志、各种专志。

由上所述，可见：掌握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才有可能做到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也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下面再就此谈谈。

科学研究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问题即“疑”，如果“疑”所当“疑”，那就是发现了问题。怎样区别该“疑”与否呢？关键在于读书，在于掌握学术动态。所“疑”的问题，如果前人或今人已经解决，那就不必再研究了。我们强调“考镜源流”的目录学，也就是要掌握学术史知识与当前学术动态，就是为了避免重复劳动。另一方面，从学术史上，从当前学术动态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学术领域中，过去或现在有过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讨论的情况如何？哪些还讨论未竟，哪些虽有结论，但仍未能倾心贵当，或尚可补充？还应注意：当前新发现了哪些资料？这些资料对过去的结论有无影响？因为学术问题研究的深入，常常是由新发现的资料引起的，如殷墟、敦

煌的发现，给文史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当然，还有一些是由于平时读书时产生的疑问，这些疑问多是由于对旧说比较分析而后提出的。

有了问题就必须进行分析：第一步，要知道关于这一问题有哪些不同说法，各自的根据是什么。第二步就要将其分类排比，找出异同所在。第三步，则就其所持的论点逐一考查，如其所据的是伪书、贋物或书有讹字与事属传闻，则所据难以成立，结论自亦随之摇动；也有所据并无明显错误，但有反证，两证矛盾，其中亦必有一误，这样也就值得讨论了。这里，就需要用到各种知识与技能，要使用较多的资料，并要对这些资料进行鉴别；而在鉴别过程中，又往往要进一步查补资料。

经过这些工作，就可归纳正、反两方面的资料，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引出正确的结论，使问题得到解决。十分明白，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在整个过程中，任何一步，都要靠正确思想与科学方法的指导，否则材料虽多，也如散乱铜钱一样不成贯串。同时也可看出：每一步都要用到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第二节 治学与积累资料

在治学的过程中都要用到“三基”，同时也要使用大量的资料。我们讲“三基”，也包括搜集、阅读、鉴别、使用资料的知识与能力。我们对资料必须有正确的看法，必须懂得怎样积累资料。

一、积累资料与实事求是

毛泽东同志提倡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的学风，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我们研究文史，当然也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句话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颜师古对

它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要“求真是”，先要“得事实”。就文史研究工作来说，也就是先要掌握大量的资料，然后再加以整理、分析，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这样引出的结论才是合乎实际的“真是”，而不是“想当然耳”的主观臆测。所以，对待资料的态度如何，实质上是学风问题。

“四人帮”他们自己不根据实际，瞎说一气，并把别人的积累资料说成“资料挂帅”，这正是他们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我们在治学时，首先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

二、资料的来源

一是书本上的，一是自己从实际中调查得来的，如调查方言、搜集民歌、发掘古代遗址、向一些亲见亲闻尤其是亲身经历过近、现代某些政治事件的人了解近、现代史料等。这种实地调查很重要。但是，人们能够直接调查的毕竟有限，大量的资料还在书本中；而且这些书面资料，有许多也是前人或今人亲见亲闻或实地调查的记录与研究的成果。例如：扬雄的《方言》、章太炎的《新方言》、罗常培的《厦门音系》、《临川音系》等，就是他们从实际中调查、研究出来的。殷墟、敦煌、仰天湖、马王堆、银雀山，我们不可能一一去调查，更不可能一一亲与其事；然而，一些学者与实际工作者所记录整理出来的图录、考释、发掘报告等等却给我们提供了宝贵资料，使我们如同身历其境，甚至比亲历所得更多，因为它已经过学者的整理。我们这样说，毫无忽视调查的意思。但“四人帮”的“读书无用论”的流毒，必须彻底肃清，我们要刻苦读书，要充分发挥书面资料的作用。

三、要重视第一手资料

以雕版印刷术的起源为例说，自从咸通九年刻的《金刚经》发现后，就确定了晚唐以前已有雕版印刷，因为实物是第一手资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当然，第一手资料不仅限于实物，例如我们又从冯宿的奏疏中看到中唐时已有雕版印刷。冯宿是亲见其事的人，他的话自然可信。冯宿文章也是第一手资料。

从一个作家说，他自己的作品是第一手资料，因为那是他的思想、生活的直接反映。他同时人关于他的言行的记载，当然也应视为第一手资料。

再如明、清的档案，各家文集集中的奏议、书牒，某些明、清人的日记、笔记等等，当然也是研究明、清史的第一手资料。

有些古书在唐或宋以后已经佚失，但隋、唐或宋初人还曾看过它，并曾从中摘抄了一些到自己书中。如《广韵》、《经典释文》、《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意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等，其中保存不少佚书资料。这类是第二手资料，但其作用近于第一手资料。

不止这些，后代学者对古书、古人的考订与评述，就考订与评述者来说，也应是第一手资料。

我们所以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就是因为它比较合乎实际。但是，这类资料大多散见各处，或者卷帙很多，往往要花费相当大的气力才能从中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因此，顾炎武把它比作“采铜于山”；而把那种辗转抄袭，改头换面，用以著书来盗名的比作把旧钱回炉铸新钱。他还说他自己治学方法就是“采铜于山”。顾炎武这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采铜于山”就是从第一手资料中采集、提炼，这样才能有创造性的收获，才是实事求是；怕费力气就会堕入人云亦云、剽窃抄袭的泥坑。

当然，对第一手资料也不能一味迷信。因为著书人会有各

种局限，如：亲与其事的有利害关系时每多讳饰；没有亲与其事的，仅据传闻，又难免与事实有所出入。而且作者的立场观点、个人恩怨以及当时的风气皆会影响到记录的真实程度。所以对第一手资料也应加以分析。还应说明：一些认真的著作，作者当时所见的第一手资料多，并经过分析研究，有所去取，因而就学术价值说，它比第一手资料的价值还高。这在后面还要谈到。

四、求实与求是互相促进的

搜集了一定数量的资料后，就可进行整理。在整理过程中，会发现其中某些方面资料还不够，这样又要进一步去搜集。后来发现的资料也有可能与原先搜集的资料相抵触，这时，又要就这一点搜集更多的资料来分析研究。研究一个问题，往往要经过多次的循环反复，逐步深入。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分为“积累资料”与“查找资料”两部分来谈。当然，两者是互相联系的。前者主要指平时的读书（包括实地调查），后者指进一步补充搜集，其实皆是搜集资料。只是平时读书应侧重读原著与有系统地读；而论证过程中补充资料时，往往侧重于使用工具书。但这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因为平时读书时也要使用工具书；而补充资料时，通过工具书知道有某些原著，这时又要认真地阅读。

还应说明，只有认真地读懂资料，才能充分发挥资料的作用。

第三节 怎样才能读懂资料

一、字词方面

有人认为这方面没有困难，这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说法，自以为懂，实则未懂。不妨设想：许慎、王逸、郑玄、孔

颖达、朱熹等人对《诗经》、《楚辞》中的字词做了那么多的研究，仍有许多未得确解的地方。可见要读懂字词，谈何容易。应该知道：经过清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古书中的许多问题已经解决。我们首先应该知道这些成果，运用这些成果。当然，也不是所有问题都已解决，其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不知道这一点，思想就不能解放，研究就不能深入。举例来说，《哀郢》中“至今九年而不复”句中并无难解的字词，然而联系屈原生平来看，前人虽对“九年”做了各种解说，终觉扞格难通。一条对屈原研究很有作用的资料，竟因“九年”一词难解反而变成研究上的障碍。但是，运用文字通假规律，找出了“九”字为“终”之借字，就能使屈原晚年生活与作品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获得解决（见拙作《读骚小笺》，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2期）。由此可见，只有字词训释正确，才能读懂资料，并使资料发挥其作用。郭沫若“想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他这样做的结果，开辟了新史学的研究。这一事实更生动地说明读懂字词与科研的关系。

字词难懂，难在哪里呢？

第一，古物、古书（甲骨、青铜器、简册、其他古书）上多通假字。对这些字，只有通晓文字构造与通假规律，找出本字，才读得懂，解得透，如“波及”即“播及”（亦即“散及”），“雪耻”即“刷耻”，“雪涕”即“洒涕”，“何彼稂矣”即“何其茸茸地”。又如：金文“贮甘家”即“予甘家”，亦即赐给奴隶甘家；如果不知“贮”即“予”，就看不懂它，更谈不上使用了。

第二，古书上有些虚词容易误解成实义。例如：《诗·谷风》“伊予来塈”，“伊”与“来”乍看皆是实词，但按着实词词义解释，义甚难通。王引之看出“伊”、“来”其实是虚词，他说：“伊，惟也；来，是也；塈读为忤，怒也。言惟我是怒也。”文